

伊朗公主 回忆录

〔伊朗〕阿什拉芙·巴列维 著

3.7375

伊朗公主回忆录

〔伊朗〕阿什拉芙·巴列维 著

许 博 译 楠 柯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原书名: Faces in a Mirror

副 题 ——Memoirs From Exile

作 者: Ashraf Pahlavi

根据新泽西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译出

伊朗公主回忆录

〔伊朗〕阿什拉芙·巴列维 著

许 博 译 楠 柯 校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出 版 社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插页二张 133,000字

1984年6月第一版 1984年6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2,000册

统一书号: 3203·042 定价: 0.60元

(内部发行)

译者的话

阿什拉芙·巴列维是伊朗已故国王穆罕默德·巴列维的孪生妹妹。曾经活跃于伊朗政治舞台，是王室的重要决策人之一。

这部回忆录是巴列维王朝覆亡以后，她流亡美国时写的。她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主线，生动地概述了巴列维王朝由兴起到灭亡的曲折历史。这一段历史，作者是把它放在美苏对伊朗进行激烈争夺的背景下叙述的，她认为，王朝的灭亡有若干内部的原因，但主要是美国的错误政策造成的。她以愤激的笔调批评了美国卡特政府的孤立主义政策，披露了卡特政府如何在伊朗危机的关键时刻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判断，又如何紧在紧要关头抛弃了国王。

历时五十余年的巴列维王朝如今已经成为陈迹了，它的功过成败，还有待于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研究。在这方面，作者作为当事人，向我们提供了从宫廷生活到政治斗争等许多不为人所知的情况。当然，作者是站在王室的立场上说话的，书中对国内外重大事件和人物的叙述，自然反映她这一立场，这些读者自能鉴别。

译者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三日

目 录

第一章	礼萨·汗.....	1
第二章	相貌酷肖的兄妹俩.....	15
第三章	婚礼.....	28
第四章	战争年月.....	36
第五章	黑豹党人.....	72
第六章	穆罕默德·摩萨台.....	115
第七章	“巡回大使”.....	143
第八章	覆亡的开始.....	177
第九章	流亡.....	201

第一章 礼萨·汗

我能想象出波斯哥萨克旅旅长礼萨·汗·巴列维当时的样子：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这个秋寒料峭的日子，他，一个身材魁梧、精力充沛、感情奔放而任性的军人，在我们家的围着砖墙的院子里绕着水池子转来转去，嘴里不停地吸着他酷爱的波斯香烟。旅长心情焦急地等着消息，他手下的士兵不离左右。三年前，我姐姐莎姆斯来到了人间，今天，礼萨·汗·巴列维盼着得个儿子。

“是个男孩！”他手下的一个士兵跑到院子里来报喜。于是，紧张的气氛为之一扫。

我父亲三步并作两步，想进屋去看一眼他的嗣子，接生婆却不放他进去。

“慢着，还有一个呢，”她说。

五个小时之后，我出世了。大家都为我哥哥的出生而兴奋，可谁也没有注意我。说我是多余的，也许重了，但也差不多。父母已经有了我那得宠的姐姐莎姆斯，现在又得了个儿子，遂了心愿。因为是和未来的王储、而后要当国王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同时出生的，我总感到不能要求父母

特别钟爱自己。

然而，正是和我哥哥的这种孪生关系，在童年时代给了我滋养和力量，并使我产生了我所知道的最为强烈的家庭观念。在其后的年代里，不管我如何想——有时是拚命地想——培养自己的个性和树立自己的理想，却一直和我的孪生哥哥保持着割不断的关系。我多次结婚，生儿育女，并以与我同代的妇女闻所未闻的方式为国家效力，也曾流寓海外（共三次），然而，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过去和现在都一直是我生活中的精神支柱。

我哥哥和我出世时，礼萨·汗已蜚声波斯政坛。他的影响是从遥远的北部山村阿拉什特（离俄国边境不远）扩展开来的。一八七六年，父亲出生在这个山村，祖父是个军官。父亲还在襁褓，祖父就去世了，撇下了无依无靠的祖母。在当时，一个处于这种地位的女人死了丈夫，日子是非常难过的，因为，失去了丈夫的保护，她在婆家实际上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

我听说，祖母是个刚强的人，她要按照自己的心愿培养儿子。她决定离开阿拉什特，回故乡德黑兰。她抱着孩子，翻山越岭，跟着商队徒步来到首都。在娘家和朋友们中间，她感到精神舒畅。

父亲很少谈起自己的童年生活，从他零星的言谈中，我了解到，由于祖父的去世，又由于祖母不接受夫家的支配（他们因此不再在经济上帮助她），他是在艰难的环境中长大的。艰难的童年生活锻炼了他的意志，教给了他自立的意義。那个

时候，只有很富裕的人家才能送孩子去接受正规教育。祖父生前是军人，由于环境的熏陶，父亲从小就想当兵。父亲选对了，他长得异常魁梧结实，是当兵的好材料。他的这种身材就是在北部山区也是少见的，而伊朗身材最高大的人就出在北部山区。

长到十六岁的时候，父亲的身高已超过六英尺，而且还在长。他报名参加了波斯哥萨克旅（波斯人和俄国人一样，管士兵叫“哥萨克”）。这是一支精锐部队，是伊朗唯一的一支“现代化”（按波斯的标准）作战部队。

礼萨·汗投效军旅之初，了解他的人就已经看出他不俗，他不会只当一个士兵，而准会干出一番事业来。他头戴皮帽，脚蹬皮靴，跨上一匹雄壮的马，相当威武。不仅如此，他还具备建立英雄业绩的资质和创造军事奇迹的胆识。随着经验的积累，他可以成为第一流的战术家和训练有素的前线战士。但是，假如他只有这些长处的话，那他也许只能做一个称职的将军而已。

他飞黄腾达，是由于他能直觉地把握战场上的心理变化，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行英勇的、戏剧性的闪击。这样，就给人以无敌的印象，赢得了士兵的绝对忠诚。他还多次把部队留在战场以外，自己不带武器，独自骑马进入持不同意见的部落首领的地盘，不止一次兵不血刃就获得了胜利。

从历史的观点看，可以说，象礼萨·汗这样一个人物早就该在波斯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要理解这一点，就要了解二十世纪初波斯的状况，即了解波斯经济上贫穷，容易受到外国干

涉,以及它处于伊斯兰世界的中心的地位。这些基本现实(我相信西方还没有理解)在今天还支配着我们的历史。

和西方的欧洲不一样,八十年前的波斯处于二千五百年来最严重的没落时期之一(只有十八世纪后半期的没落情况比它更严重),从居鲁士和大流士时代高度发展的文明国家变成一个由政治上破了产的腐朽的恺加王朝统治的贫穷国家。它一百六十四万八千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土划分成十个省,这些省既无道路,又无通讯系统同政府所在地德黑兰相联系。有时,要到我国的一个省去,竟然不得不绕道其他国家,去胡齐斯坦省得取道伊拉克,去霍拉桑省则要经过俄国。

除了德黑兰、大不里士和其他城市有商人和手艺人之外,波斯是一个由许多大庄园组成的农业国。佃农在有利于地主们(通常被称为“千户”)的封建制度下生活和做工,过着赤贫的生活。游牧部落象他们千百年来老祖宗一样,赶着羊群逐水草而居。几百年前,人们就知道地下蕴藏着石油,但一直没有资金和技术去开采。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原始的中世纪的国家,没有公路,没有卫生设备,没有邮政服务,没有学校,没有医院,百分之九十八的居民是文盲,妇女实际上没有公民权,人的平均寿命仅三十岁,婴儿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

政治实权掌握在地主和部落头领手里(他们都有一支常备军),这些人实行一种原始的制度,完全控制着各自治下的人民。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个由许多各自为政的省政权组成的国家。国王纳斯尔丁王(一八四八——一九六)成了个傀儡,部

落头人们对他只表示象征性的尊重。他的实际地位也许可以从其征税的方式得到说明。在理论上，税收要直接交到王家金库，但是国王事实上却无力去征收，而是由头人们带着兵丁以“税务局”的名义去收税，但他们在上交税收之前总是私自从中扣下很大比例的款项。王家金库经常空空如也，政府向德黑兰市场的商人借钱的事也不是没有过。

由于国力衰微，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一支能打仗的军队，波斯总是受到外来的干涉。如果我们要了解今日伊朗的民族感情，我们就必须记住，虽然波斯从来没有成为殖民地，但它经常受到比自己的军队更加强大和武器更加精良的军队的入侵和渗透。

对于北面的俄国来说，波斯过去和今天一样，与俄国有着一千八百公里的共同边界，是俄国通往暖水港的要道。至于英国，波斯给了它未曾开发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工业化西方的命根子），成了它在亚洲和非洲的辽阔的殖民帝国进行合乎地缘政治学逻辑的扩张对象。这些大国都各自和部落头人结成种种联盟，英国和俄国通过他们经营各自的势力范围，必要时还出动军队支持他们。

波斯的经济破产及易受外来干涉等等问题，必须放在尚处于蒙昧时期的伊斯兰传统的背景上来看。虽然伊斯兰教承认世俗事务和宗教要分离，但什叶派教士（毛拉们）一般说来在政治上比逊尼派教士活跃。伊斯兰教什叶派是波斯的国教，而逊尼派则在埃及、阿曼、卡塔尔和科威特等国占绝对多数。波斯许多有影响的教士都和外国的，特别是英国的代表结成

联盟。波斯有一则老笑话说，如果你从一个教士的下巴上拔下一根胡子，可以在它的背面看到“英国造”的字样。

这些什叶派毛拉左右着群众的思想。在农村，毛拉们往往是唯一能读能写的人。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既是法官，又是教师，他们能解释真主的声音，作出进天堂的许诺。有时真主的声音听起来带英国或俄国腔，这时农民就难以辨别，从何处开始，政治取代了宗教。

鉴于这种局面，又无能力统治这个大约有一千万人口的穷国，纳斯尔丁王更加愿意待在欧洲物质文明更高的首都，不肯回来。钱不够花了，就去找英国人和俄国人，他们都乐于帮忙，作为回报，他们在波斯获得了一系列采矿的特许权，实际上是以波斯的资源作抵押。到一八九六年纳斯尔丁王被暗杀时，他已经把国家的捕鱼（做鱼子酱的鲟鱼）专利权拱手让给了俄国人。同时也给了英国人许多特权。

在他的儿子穆扎法尔丁王统治时期仍然是这种样子。一九〇一年，他以二万英镑的代价把波斯南部的石油开采权租让给了英国企业家威廉·诺克斯·达西。这一协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协定，后来成了不仅是波斯和英国之间的，而且是波斯内部的激烈的政治斗争的焦点。波斯的整个历史直到这次革命本身，以及现在的危机，都和石油问题的历史分不开。

随着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青年波斯人”运动的展开，一个转折点，一种对外国人剥削的反抗来到了。这个运动的宗旨是要成立一个立宪政府，消除外国在波斯的影响。这种与

外部世界始则联合，继则反抗、革命，而后对它失去幻想的基调，在中东政治的格局中屡见不鲜，这种格局过去和现在都周而复始地有规律地出现。

立宪派的势力在阿塞拜疆省首府大不里士特别大。阿塞拜疆紧挨着俄国和土耳其。土耳其在二十世纪初蓬勃开展的“青年土耳其人”运动，它的宗旨是推翻哈里发统治，结束外来干涉，建立共和国。

俄国沙皇不愿看到立宪运动在俄国旁边发展蔓延，于是支持恺加王。他派出俄国军官训练和指挥哥萨克旅，使之忠于王朝。而英国人则支持立宪派。一九〇六年，立宪派获得了胜利，他们迫使国王同意成立国民议会。两年以后，当国王穆罕默德·阿里解散议会，逮捕“青年波斯人”的时候，俄国人命令哥萨克旅支持国王。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在波斯进行的一种政治搏斗。这种搏斗增强了人民心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感觉，即波斯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外国干涉的结果（这种感觉今天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了）。

在大战期间，波斯宣布中立。但是，我们的边界受到了俄国人、英国人和土耳其人的侵犯，他们在波斯国土上进行最残酷的战争，矛头所向，往往不分平民百姓和敌方士兵。五年仗打完，波斯疲惫不堪，人民垂头丧气，这是一个绝望的国家的民族情绪。

一九一九年八月，即我出生之前两个月，恺加王不很情愿地和英国签订了一项条约，根据条约，英国向波斯提供援助和武器，波斯则答应英国通过派技术和军事顾问继续其在波斯

的存在。作为革命的副产品，俄国人开始在北部里海沿岸的一个省里播撒布尔什维主义的种子。在首都，有人煽动人民反对英国人及其与波斯签订的条约。要求国王退位的呼声越来越高。

我父亲并不是一个劲头十足的政治人物（做了国王以后还称自己是个小兵）。他把全部精力用来提高军事技能。他在哥萨克旅中果然是连连升迁。然而，他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了，为什么他的部队要听从俄国军官的命令？为什么派他们去镇压立宪派的爱国精神？后来，他注视着土耳其的民族主义的斗争。土耳其的穆斯塔发·凯末尔（后来人们称他为阿塔图尔克），跟他一样是个军人，却使一个被人叫做“欧洲病夫”的遭到严重破坏的土耳其一变成为一个新的国家。

礼萨·汗加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赢得了士兵的绝对忠诚之后，就清洗了俄国军官。一九二一年二月，经过精心策划，父亲带领二千名哥萨克开进德黑兰，控制了首都，完成了一次不流血的政变。继承穆罕默德·阿里的艾哈迈德王名义上仍然是国王，但父亲作为陆军总司令和国防大臣，支配着德黑兰政府。一九二三年，他出任首相。

带兵征讨盛产石油的胡齐斯坦省的强大部落，并迫使他们臣服之后，他的权力就彻底稳固了。一九二五年，立宪会议宣布结束恺加王朝历时一百三十年的统治。

这时候，波斯（一九三五年以前还不叫伊朗）必须决定采取何种政体。父亲想效法土耳其，建立共和国。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地位最高的什叶派毛拉们。教士们——他们坚决

支持封建制和君主制，维护体现现状的一切传统——在圣城库姆开了一个会，告诉我父亲，他们反对建立共和国的计划。这样，礼萨·汗就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被宣布为波斯国王。那时哥哥和我是六岁。

礼萨王如今是波斯实力最大的人了。那些使他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士兵的品性——锐利的目光能使部下垂手屏息，他疾恶如仇，不能容忍错误和缺点，坚决按严格的军纪办事——也同样使他成为一个使人畏敬的严父。我只要一看见他那旁边镶着红布条的裤腿，就赶紧跑开，我认为，避免父亲生气的最好办法是躲得远远的。

回想起来，父亲一次也没有处罚过我们，但他的出现总让我们这些孩子感到害怕，他因为生气而提高嗓门说话的时候真吓人，多少年以后，我是一个成年妇女了，仍然想不起有过不害怕他的时候。

我母亲塔吉·穆鲁克在外表上与父亲截然相反。她长得纤弱、矮小，有一头亚麻色的头发，一双美丽的蓝眼睛。她的身高只能勉强够着父亲军服上的肩章。但她也和父亲一样强硬，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她不怕和父亲争吵，敢于对他的决定提出异议，而当时伊朗妇女是披面纱，并且“深锁闺闼的”，她们实际上没有权利，人们要她们完全服从男人。

父亲和舅父同在哥萨克旅当兵。父母是按照传统的波斯习俗结婚的，婚前相互之间没有见过面。那时候的姑娘通常十几岁就结婚，而我母亲二十四岁才结婚。后来，父亲常逗她，说：“你的运气真不错，岁数这么大了还找到了婆家。”

“不，不，”她总是这样争辩，“你完全错了，那时我才十八。”

我和哥哥还很小，母亲正怀着阿里·礼萨时，父亲又娶了一个妻子，是个年轻得多的女人。（其实，父亲十七岁时和他表妹马尔雅姆·哈努姆结了婚，她生女儿哈姆达姆·萨尔塔内赫时死于产褥。）虽然一夫多妻是普遍现象（伊斯兰教规允许男人娶四个妻子），而且人们要求妇女接受这种情况，但母亲却非常生气，她很长时间不愿见我父亲。国王的权威受到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无可奈何，一看见我母亲来就躲开。回想起这些，我想我一定受了她的影响，她在那种要求妇女低眉顺眼、默默无闻的社会里树立了拥有力量的榜样。

父母最后还是相互谅解了。父亲和他的第二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又和第三个妻子生了五个孩子。我们一共十一个孩子，遵从我母亲的意愿，三个母亲生的孩子很少在一块儿玩（后来，我们大部分人都很友爱）。我母亲是名正言顺的王后，我哥哥是王位继承人。另两家住在王宫的其他房子里。

我们家虽是个大家庭，但我的童年生活经常是孤独的。莎姆斯是老大，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我哥哥是长子，又是王储，自然是人人钟爱。我早就明白，我是排不上号的，必须寻找自己的位置。后来，批评我的人说我在这方面做得过分了，说我无处不插手。但我做孩子时却根本不惹人注意。

我的女性同伴只有我的保姆和一位双目失明的妇女。保姆是来自沙赫里斯塔纳克的农村妇女。盲妇（她的侄女现在还和我在一起）常常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给我讲故事，编造些王

子如何得了莫名其妙的病，以及某国王有三个美丽公主之类的传统的神话故事，给我们日常生活的严格气氛增添了浪漫绚丽的色彩。

由于感到孤单，我并不经常想到自己是个公主。只是在为父亲举行加冕典礼的那天，我的公主身分才显露了一会儿。我和保姆站在一大群乱哄哄的人中间，当几匹白马拉着一辆光彩夺目的四轮马车在面前经过时，我看见父亲头上戴着缀满宝石的王冠坐在车里。街道上空回荡着“国王万岁”的欢呼声。我被裹在人群中往前走，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

此后不久，我们搬进了古列斯坦宫，亦即玫瑰花宫。古列斯坦宫建成于一八〇六年，是法斯·阿里·沙阿·恺加为安置他的儿孙建造的，他共有儿孙二千个。我父亲不愿住在那里，虽然他白天在那里办公。对他来说，住在那里会被恺加王朝的国王们的不光彩历史所玷污。他要营造自己的宫殿——大理石宫。因为我哥哥要在那里举行婚礼，这座宫殿于一九三八年按时竣工。大理石宫离古列斯坦宫约三公里，位于现在德黑兰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其时，父亲住在离王宫不远的一座非常简朴的小房子里。身为国王，他无疑有条件过豪华的生活，但他仍然喜欢过那种斯巴达式的简朴的军人生活。他常常席地而卧，身边只有一件小小的奢侈品：一只银质烟盒。

刚开始过宫廷生活的那些日子，我们这些孩子整天好奇地到处走动，在那长着葱松翠柏的院子里游息，在饰有巨幅壁画的大厅穿行，观赏那嵌满了钻石般闪闪发光的小块镜子的

天花板。

在宫殿的正厅里，有一把大理石的御座，父亲就是坐在它上面接受加冕的。还有一把世界闻名的孔雀御座，那是一把有扶手的、华美的、金色的椅子，镶着钻石、红宝石和其他各种宝石。孔雀御座以及其他一些名贵之物是二百四十年以前纳迪尔王从印度弄来的。他是象拿破仑·波拿巴那样有雄才大略的波斯人的先驱。

我们搬进新居之后，礼萨王就叮嘱我们，不能再有轻浮的举止，我得叫我哥哥“殿下”，父亲自己将在这方面带头。我未必确切地理解了“殿下”二字的含义，但我知道，这是将哥哥和我们分开的又一种方式。

我跟母亲、姐姐和保姆住在宫殿的内廷，那里是女眷的住处，恺加王的宠妃们曾在这里居住。我们的居室算不上豪华，但拿欧洲的标准来衡量是舒适的，屋里摆着恺加王访问欧洲时带回的礼品，有威尼斯的玻璃枝形吊灯，法国的花瓶，以及法国式的家具。我哥哥住在另外一套住房里，跟他住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家庭教师，保镖和其他随从。

莎姆斯喜欢玩她的玩具娃娃，或是在母亲身边转来转去。我和她不一样，喜欢和哥哥一起玩（有时我没有得到许可就私自跑出去和他玩上一、两个钟头）。但大多数时间我们不能待在一块儿。每天早上，老师给他和他的朋友们上课，而我和莎姆斯则另有功课。不过，我们长大一些以后，我经常可以在十一点半跟哥哥在一起，确切地说是和父亲一起吃饭（弟弟阿里·礼萨长大后也参加进来了）。我们是奉命这样做的，如果